

THE
STUDY OF
LABOR DEMAND
AND SUPPLY
IN
MACAO

郝雨凡 林广志 主编

澳门 劳动力需求与供给研究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澳門大學
UNIVERSIDADE DE MACAU
UNIVERSITY OF MACAU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澳门劳动力需求与供给研究 / 郝雨凡, 林广志主编. —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7. 10

ISBN 978 - 7 - 218 - 11933 - 5


I. ①澳… II. ①林… III. ①劳动力—供需平衡—澳门—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F249.276.59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70175 号

AOMEN LAODONGLI XUQIU YU GONGJI YANJIU

澳门劳动力需求与供给研究

郝雨凡 林广志 主编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 肖风华

责任编辑: 梁茵 陈泽航

封面设计: 水玉银文化

责任技编: 周杰 吴彦斌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真: (020) 83780199

网址: <http://www.gdpph.com>

印刷: 广东东莞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 787 mm × 1092 mm 1/16

印张: 12.5 字数: 180 千

版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 - 83795749) 联系调换。

目 录

人口结构与经济转型：以近代澳门为例	林广志 李 超 / 1
近代澳门人口变动及统计机制研究（1867—1910）	赵新良 / 34
澳门劳动力市场的结构：特征、问题与对策	李建民 / 56
澳门经济与劳动力市场的问题和对策	翟振武 邹华康 / 72
澳门就业人口结构变化与劳动力供给趋势分析	陈卫民 / 97
澳门劳动参与率的特征及其影响	刘 毅 / 114
澳门比较劳动生产率与就业效率研究	王 芳 周 兴 / 127
澳门的劳动力供给与需求	——兼论外来劳动力与本地劳动力之关系 ····· 娄世艳 / 141
澳门微型经济背景下劳动力需求与人才培养政策探讨	····· 李嘉曾 / 168
澳门人力资本结构与创新能力	····· 魏下海 陈思宇 罗永华 / 181
后记	····· / 195

人口结构与经济转型：以近代澳门为例

林广志 李超*

摘要 19世纪中后期，澳门经历了自开埠以来最重要的一次经济转型期，传统的转口贸易优势逐渐被以鸦片走私贸易、苦力贸易和赌博业为主导的新经济所取代。以大批内地华人迁入为主要特征的人口结构变迁进一步优化了澳门社会的人口抚养比、男女性别比、族群结构以及职业社会分工，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持续的“人口机会窗口期”。华人资本和劳动要素的增加，对贸易方式、产业结构和资本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推动了此次经济转型的实现。随着转型期华人商业阶层的形成，澳门的城市化进程加快，初步完成了由传统渔农社会向现代商业社会的过渡。在此期间，华人之于澳门的重要作用得到充分体现，并逐渐成为澳门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而作为此次转型的阶段成果，其制度特征与主导产业得以延续至今，对当今澳门经济社会乃至中国内地城

* 林广志，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李超，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本文系澳门大学澳门学研究重大项目“全球视野下澳门华人社会研究——从开埠到1911年”（编号：MYRG199〔Y1-L4〕-FSH11-HYF）的阶段性成果。作者感谢张中鹏博士、赵新良博士在数据收集中给予的协助，感谢曾金莲博士对部分葡萄牙语文献的翻译整理。

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人口结构 经济转型 城市发展 澳门 19 世纪

19 世纪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是澳门新经济模式孕育、选择、成型、确立的重要历史时期，^①亦是自 16 世纪中叶澳门开埠以来最重要的一次转型期，其后所建立的经济发展模式一直延续至今。关于这一阶段澳门经济演化轨迹的探讨始终是澳门历史研究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在现有相关研究中，较为关注的是仍以对特定历史事件的考证为重心，鲜有基于历史学、人口学、经济学意义的经济转型内在规律的探寻。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了澳门经济的此次重要转型？以大批内地华人迁入为主要特征的人口结构变迁与澳门经济转型有何内在关联？人口增长与经济转型对澳门城市化进程带来了什么影响？在探索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人口增长与社会承载力平衡发展的今天，从人口学、经济史和城市发展理论的视角重新审视近代澳门的此次转型轨迹，对于把握城市内在运行规律、引导未来澳门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尤显必要。

一、19 世纪澳门经济的转型之路

随着国际贸易航线的中断，自明末清初开始，澳门经济进入持续衰落期。鸦片战争以后，随着香港开埠、实行自由港政策以及内地通商口岸的相继开放，澳门作为唯一转口贸易口岸的优势彻底消失，随之而来的是澳门对外贸易形势的进一步恶化。正如葡人贾一梅·德鲁索（Jaime do Inso）所言，“尽管澳门在它坎坷的历史上经历了许多危机，

^① 本文所考察的转型期主要集中于 19 世纪中叶，但由于“新经济模式”的孕育、选择、成型和确立贯穿于整个 19 世纪，故而本文的部分资料和史料论证未完全拘泥于转型期范畴。

但 1842 年才是它真正衰落的日子”。^① 英国占领香港岛后的第一个布告就提出，凡属华商与中国船舶来港贸易，一律特许免纳任何费用赋税。1841 年 6 月 7 日，港英当局正式宣布香港为自由港，允许外国货物自由进出，一般不征收关税。外国货物进口以后储存、整理、分类、再加工、再包装或者再出口等都不受限制。与澳门相比，香港不仅具有更加优良的港口条件和纵深腹地，而且拥有更加优惠的国际贸易政策。这使得长期以来过度仰仗明清政府转口贸易专营权的澳葡当局，面对英美诸强及香港的贸易竞争显得手足无措。尽管 1845 年 11 月葡萄牙女王擅自宣布澳门为自由港，但是由于澳门港已是淤泥浅海，停泊不便，其效果十分有限，“凡外夷通商之船，遂弃澳门，聚香港，澳门因而廛市萧条”。^② 从澳葡当局自身来看，由于贸易形势的盛极而衰，其赖以谋利的贸易工具和手段也遭到严重的破坏。清政府特许的二十五艘额船大多破败不堪，澳葡当局无力维修，承运能力大打折扣，“始经题定澳限额二十五艘，后有覆于水者，有利不能营运者，有坏不修者，年不过十艘”。^③ 至道光二十三年（1843），当清政府准许澳葡赴五口通商贸易，澳葡竟然“实在无力前往”。鸦片战争后，由于大批商人离澳赴港，满街都是人去楼空的景象，澳葡议事会财政收入所依赖的房屋租赁业也一蹶不振，澳门失去了几乎是最后的谋利途径。面对国际转口贸易地位的逐渐衰败，以及日益恶化的财务状况，澳葡当局急需寻找

① [葡] Jaime de Inso, *Macau: A Mais Antiga Colónia Europeia no Extremo Oriente*, Macau: Livros do Oriente, 1990, p. 25.

② [清] 金武祥：《粟香随笔》，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合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 6 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259 页。

③ [清] 田明耀主修、陈澧等纂：《香山县志》卷 8 “海防”，台湾学生书局 1965 年据清光绪五年刊刻影印本。按：雍正三年（1725）两广总督孔毓珣题定澳门葡人额船 25 艘往来贸易，由香山县编列序号，刊刻印烙，各给验票，享有优惠，参见陈文源：《清中期澳门贸易额船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北京），2003 年第 4 期，第 113 页；黄启臣：《清代前期澳门时外贸易的衰微》，《广西社会科学》（南宁），1988 年第 2 期，第 87 页。

新的财政收入来源以清偿债务和维持市政的日常运转。在此背景下，以鸦片走私贸易、苦力贸易和赌博业为主要特征的新经济模式便应运而生。

（一）由国际转口型贸易转向内陆消费型贸易

自澳门开埠以来，葡萄牙商船长期经营着澳门—果阿—里斯本、澳门—长崎、澳门—马尼拉—墨西哥三条国际商贸航线，澳门也因此经历了长时期的兴盛和繁荣。^①至17世纪中期，随着三条海上商路的陆续中断，澳门作为东方转口贸易港的地位日趋衰落。即使清政府不时给予澳葡政府一些贸易政策优惠，亦不能从根本上挽救澳门转口贸易的颓势。在内外交困之下，以鸦片走私贸易、苦力贸易为主要形式的消费型贸易逐渐取代历时已久的传统转口型贸易，^②其贸易方式开始发生变化。

1770年以后，澳葡政府对华商走私鸦片百般庇护，尤其是允许外国人租用其额船贩运鸦片。为了对付广东官府的查验以求蒙混过关，澳葡还与华商联手，大量贿赂官府吏员。1815年，澳葡政府公然设立鸦片贿赂基金，对每箱鸦片抽收40元，每年总额约10万元，专门用于对清朝官员的行贿。^③而1845年的所谓“自由港”政策，实际上是走私鸦片大开方便之门。在澳葡政府的“经营”下，澳门迅速成为仅次于香港的鸦片走私贸易中心。据有关数据显示，从1845年开始，“熬制的鸦片一度通过澳门转运”。^④1862年6月，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

① 林广志、张中鹏：《明清澳门经济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澳门研究》（澳门），2014年第1期。

② 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广州海关志编纂委员会：《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粤海关报告汇集》，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82页。

③ [英] 格林堡著，康成译：《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01页。

④ [葡] 施白蒂著，姚京明译：《澳门编年史（十九世纪）》，澳门：澳门基金会，1998年，第91页。

向总理衙门报告说，“现查澳门绕越私入内地洋药，每月有五六百箱之多，而随此大宗洋药，其余进出口各项货物均系漏税之件，以致百弊丛生”。^①由于走私活动猖獗，通过粤海关进入中国的鸦片数量，通常不到实际数量的十分之一，澳门也因此成为香港鸦片进入中国的重要贸易口岸，每年分销总量大致保持在1万箱以上。^②

在大量走私鸦片的同时，苦力贸易被葡萄牙人大规模地经营起来，澳门逐步取代厦门成为中国苦力移民的中心。鸦片战争以后，澳葡政府将苦力贸易作为自主经营的贸易活动，不断出台法规维护苦力贸易的正常秩序，猪仔馆遍布澳门各个角落。苦力贸易因此得到迅速发展，从澳门转运至国外的苦力数量逐步攀升。1856年，从澳门贩运出洋华工为2578人，至1858年已超过1万人。^③经过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的短暂萧条，从1862年开始反弹，至1866年达到24401人（见图1）。1871年，澳门的“苦力贸易行”（“猪仔馆”）有24间，1873年已高达95间。庞大数量的苦力经澳门运出，为澳葡政府赚取了巨额收入，“奇货可居，获利极厚，每名归西洋国税洋一圆，归澳门议事亭番官使费两圆”。^④1846年7—12月，澳葡政府公物会财务报表显示，当年苦力贸易收入为255621两，竟然超过了外国船只在函仔抛锚费之收入（230175两）。^⑤

① 转引自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764页。

② 《1866年广州口岸贸易报告》，广州市地方志编委会、广州海关志编委会：《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粤海关报告汇集》，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4页。

③ [葡]古万年、戴敏丽：《澳门及其人口演变500年（1500—2000）：人口、社会及经济探讨》，澳门：统计暨普查司，1998年，第129页。

④ 夏东元主编：《郑观应集：救时揭要》，《澳门猪仔论》，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

⑤ Junta da Fazenda Publica de Macao [N], *Boletim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o, Timor, e Solor*, 1847-02-11 (Vol. II N. o6), p. 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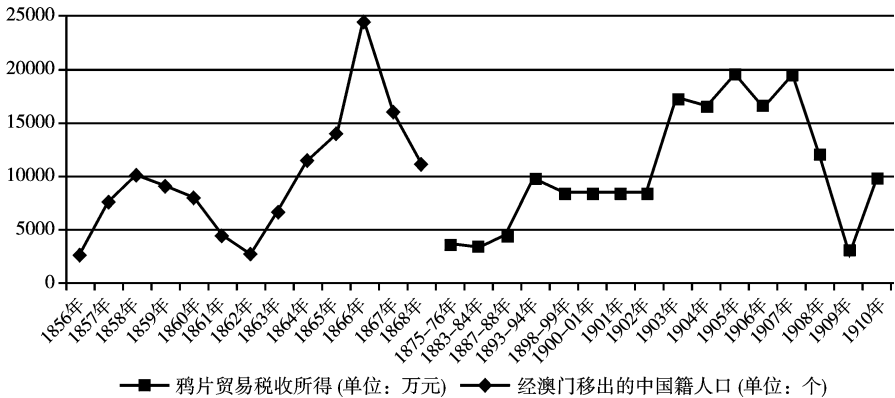


图1 19世纪中叶后澳门鸦片贸易与苦力贸易简况

数据来源：1911年澳门政府报告第16页、1868年澳门政府统计厅《关于此地区的中国籍人口》，第50页。

(二) 产业结构转型与主导产业形成

19世纪上半叶，构成澳葡政府收入来源的支柱产业有三个，一是面对本地华洋人口而逐步发展壮大的本地商贸业，二是从规模和形式来看已经逐渐式微的转口贸易业，三是带有政策和自然垄断色彩的房屋租赁业。^① 清乾隆朝以后，规定所有到广州贸易的外国商人及其眷属都必须在澳门居住，不得在广州滞留。与此同时，澳门的房屋兴建又受到中国政府的严格管制，房屋供求比例的失衡导致了住房租赁价格的不断攀升，^② 房租收入一度成为鸦片战争以前澳葡政府和葡人居民的重要收入来源。^③ 但是无论是转口贸易还是房屋租赁业，均依赖于国内外时局变化和清政府的政策眷顾。从这个角度而言，在鸦片战争前并未形成真正

① 郭小东：《19世纪前期澳门经济特征论略》，《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广州），1994年第4期。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合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2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5页。

③ [美] 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4卷，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62页。

意义上的主导产业。

伴随传统贸易的式微以及鸦片走私贸易、苦力贸易的兴起，以及同时期清政府对赌博业的严令禁止，这一时期，赌博业在澳门获得了长足的发展。1810年6月，澳门成立了一家以资助福利和慈善机构的彩票发行站，^①此举揭开了澳葡政府通过赌博行业增加财政收入的序幕。1846年2月16日，澳葡总督发出训令，批准番摊赌博。1847年1—6月澳葡政府公物会的财务报表首次出现“公共客栈及博彩房间许可证的收入”“经营中国彩票五个月许可证的收入”等栏目类别。仅1847年上半年，上述两项赌博专营的承充收入之和已高达78万两。^②鉴于赌博税收正式纳入政府财政，可以说，1847年实为澳门赌博合法的起始之年。其所谓“中国彩票”，先是番摊，继之为闹姓及白鸽票，至1849年，“加之随后产生的中国式赌博闹姓（Vae-seng）和白鸽票（Pacapes），成为保持澳门财政平衡的一种有效方式。在英国人占领香港引起经济衰退后，赌博活动更成为一种交易，而且很是盛行”。^③赌博业的兴旺，使之迅速与鸦片贸易、苦力贸易一道，成为澳葡政府三大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1875年以后，以中式彩票和番摊为主的赌博业一直稳定在政府财政收入的50%左右，^④并且其收入逐年攀升，主导性产业优势不断凸显。

① J. J. Silva, *Repertorio Alfabético e cronológico Índice Remissivo da Legislação, Ultramarina*, “Loterias”, Lisboa: TYP. J. F. Pinheiro, p. 183. 转引自胡根：《澳门近代博彩业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9页。

② Junta da Fazenda Publica de Macao [N], *Boletim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o, Timor, e Solor, 1847-08-12* (Vol. II N. o 27 e 28), p. 106.

③ [葡] 施白蒂著，姚京明译：《澳门编年史（十九世纪）》，澳门：澳门基金会，1998年，第102页。

④ [葡] 古万年、戴敏丽：《澳门及其人口演变500年（1500—2000）：人口、社会及经济探讨》，澳门：统计暨普查司，1998年，第27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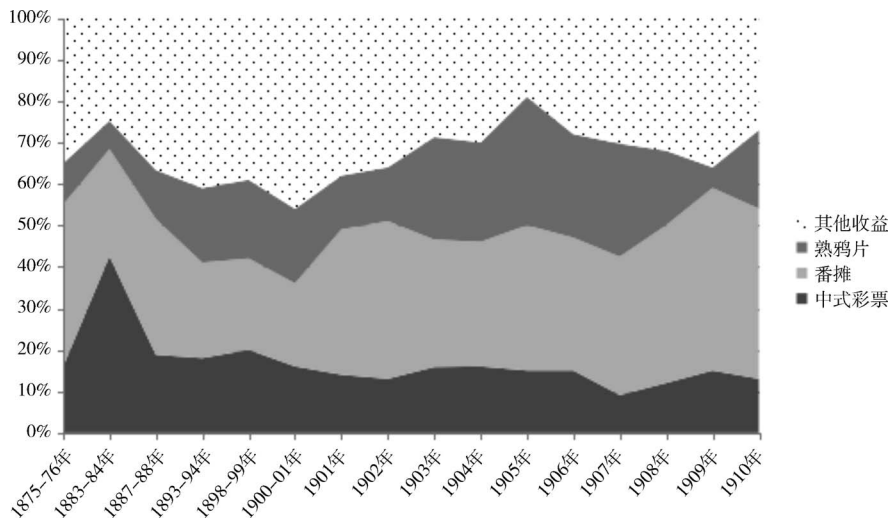


图2 1875—1910年澳葡政府税收结构

数据源：作者根据1911年澳门政府报告第16页有关资料整理。

(三) 华洋资本结构的变化

19世纪澳门经济转型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华洋资本结构的变化。澳门开埠以来，坐拥额船之利、垄断东西海上商路的葡萄牙人通过转口贸易迅速实现了资本积累，并逐渐在澳门半岛地区形成了一个以葡萄牙商人占据主导地位、大量华人聚集谋生的华洋杂处的社会。^① 值得一提的是，葡人资本的优势地位是凭借其殖民者的一系列垄断特权而获得的。早期澳葡政府规定，只有葡人方可组建公司，而华人之兴建土木，须报香山或澳葡议会准许。这些规定实际上赋予了葡人开办公司和开展房屋租赁业的专营权。随着澳门城区扩大和人口增加，葡人逐渐将剩余房屋出租给华人、外国商人从而收取高额租金。^② 可以说，在19

^① 林广志、陈文源：《明清时期澳门华人社会研究述评》，《港澳研究》（北京），2014年第1期。

^② [美] 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4卷），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62页。

世纪以前，虽然华人资本时有兴衰更替，但在澳门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仍为葡人资本，华人多从事工匠、商贩、通译等出卖劳力和提供服务的工作，其经济处于附属地位。^①此外，除葡萄牙资本以外，其他国家如西班牙、英国等在不同时期与葡商均存在贸易合作，但合作的具体内容以鸦片走私等非法活动为主，且贸易的目的地主要为广州等东南沿海地区，澳门对于这些外商而言只是栖居生活之地，而非投资兴业之所。^②因此，除葡萄牙以外的其他外国资本在近代澳门经济的比重并不高。

进入 19 世纪以后，长期以来形成澳门华洋资本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澳门经济转型的加速和各项商业制度的完善，往返于省澳之间的华商数量大增，“南、番、香、顺等县，商民来往省澳者，何止万数，往往两地置产，两地行商，无从限断”。^③此外，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红巾之乱、土客械斗等一系列动乱以后，大批华人携家资赴澳，加速了澳门从传统渔农社会向现代商业社会的转型。至 1867 年间，“澳门贸易的关键掌握在华人手中”，^④随着商业的迅速崛起，华商逐步控制了澳门的各大产业群，其商业地位也从附属型转向主控型，华商逐步成为晚清澳门规模最大、资产最多的商人群体。这个群体从内地或海外“逐利而来”，加上本土成长起来的华人从商者，逐步组成一个最广泛、最富裕、最活跃的阶层——华商阶层，成为中葡政府不可小觑的、而且

① 郭小东：《19 世纪前期澳门经济特征论略》，《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广州）1994 年第 4 期。

② [英] 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年，第 120 页。

③ [清] 黄培坤：《澳门界务争持考》，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合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 6 册，第 559 页。

④ [葡] 曼努埃尔·德·卡斯特罗·桑帕约（Manuel de Castro Sampaio）著，全国平译：《澳门的华人（Os Chins de Macau）》（香港罗郎也印字馆〔Typographia de Noronha e Filhos.〕1867.）第十三章《商业与工业》，《澳门研究》（澳门），2011 年第 2 期。

都欲加以控制的重要社群力量。从华人资本涉足的商业领域来看，主要包括鸦片业、苦力业、赌博业、商贸业、旅游业、金融与典当业、造船业、渔业、房地产业、制造业等几乎所有类别，而葡人资本的生存空间日渐压缩。据 1821 年在澳葡人估算，他们的资产合计约 300 万西班牙元，其来源除开 1820 年代以前的鸦片走私收益和 25 条年久失修的额船外，主要集中在房地产领域。^① 澳葡政府的财政收入、公共支出以及“解缴”葡国的款项，逐步依赖华人缴纳的多项公钞税赋。1909 年 10 月 16 日，《澳门宪报》公布当年“纳公钞至多之人”，其中，葡人 8 人，华人 15 人；至 1911 年，在纳公钞最多的 30 人中，华人比例增加至 22 人。^②

二、经济转型背景下的人口结构因素

早在 1798 年，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便在其代表作《人口学原理》中开创性地提出，“人口是经济发展的函数”。^③ 莫迪利安尼（Franco Modigliani）的生命周期消费理论亦指出，全社会不同年龄段的人口结构比例会影响经济体的总消费率与总储蓄率，进而会对整个宏观经济周期产生深远影响。^④ 无论是从要素供给层面还是消费需求层面，人口结构均应视为经济发轫转型的核心变量。^⑤ 作为世界上人口

① [瑞典] 龙斯泰（Anders Ljungstedt）著，吴义雄等译：《早期澳门史》，北京：东方出版社，第 38 页。

② 《澳门宪报》1909 年 10 月 16 日、1911 年 8 月 26 日。

③ Thomas Robert Malthus. 1798.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Chapter V, Oxford World's Classics reprint. pp. 39 - 45.

④ Franco Modigliani, 1966. “The life cycle hypothesis of saving, the demand for wealth and the supply of capital.” *Social Research*, 33 (2). pp. 150 - 217.

⑤ 相关研究可参见：I. E. Nikulina and I. V. Khomenko, 2015. “Interdependence of Demographic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Regions”, *Procedia -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166, pp. 142 - 146; Wei and Hao, 2010, “Demographic Struc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ol. 38, pp. 472 - 491.

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人口结构因素也一直是近代以来澳门经济转型的内在动因。从澳门开埠以来的人口演化轨迹来看，自16世纪至18世纪末，其历史人口高峰期几乎稳定在12000—15000之间。然而，这一人口峰值在进入19世纪后迅速解体。通过文献数据和历次普查数据可知，澳门的传统人口体系在1820—1850年之间出现了剧烈而深刻的变化，^①其原因并不在于澳门经济和战略地位的凸显，而是源源不断的内地尤其是青壮年男性人口的大量迁入。

综合来看，转型时期澳门的人口结构变化特征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人口抚养比、^②人口性别比、族群结构以及职业和社会分工。

（一）人口抚养比

18世纪中期以来，随着东西方贸易的发展以及华洋冲突的增加，清政府开始将澳门作为外国来华商人及其眷属的集中居留之地。1761年，法国和荷兰东印度公司率先进驻澳门，随后丹麦和瑞典东印度公司跟进；1773年和179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西班牙商人获准居澳；其后，美国商人、其他国家散商也相继获得澳门居留许可。^③这些外国商人在贸易季节从事海上贸易，而将其家眷安置于澳门。此时，澳门的人

① [葡] 古万年、戴敏丽：《澳门及其人口演变500年（1500—2000）：人口、社会及经济探讨》，澳门：统计暨普查司，1998年，第22、23、55页。

② 人口抚养比是指人口总体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它表明，整个社会中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负担多少非劳动年龄人口。其计算公式是：人口抚养比 = (非劳动年龄人口数 ÷ 劳动年龄人口数) × 100%。非劳动年龄人口指14岁及以下和65岁及以上人口，劳动年龄人口指15—64周岁人口（美国人口咨询局：《人口手册》中译本第四版，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01年，第8页）。少年抚养比是指14岁及以下少年儿童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以反映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要负担多少名少年儿童。老年抚养比是指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对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用以表明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要负担多少名老龄人口。

③ [瑞典] 龙斯泰（Anders Ljungstedt）著，吴义雄等译：《早期澳门史》，第49页。

口年龄结构呈现出老幼妇孺居多、人口抚养比偏高的特征。^① 据富雷塔斯 (José de Aquio Guimaraes e Freitas) 1828 年出版的《澳门回忆录》显示,“澳门大堂区有 14 岁以上的成年男子 289 人,未成年男子 251 人;疯堂区成年男子 258 人,未成年男子 170 人;花王堂区成年和未成年男子分别为 59 人和 52 人”。^② 三大堂区的基督教人口中,共计成年男子 606 人,未成年男子 473 人。若纳入成年及未成年女子进行估算,三大堂区基督教人口的少年抚养比高达 70% 以上。虽然上述统计中未能包括为数众多的华人人口,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勾勒出了 19 世纪前期澳门社会的人口发展轨迹。

19 世纪中叶,随着内地移民的大量涌入,澳门的人口年龄结构开始发生剧烈变化,劳动年龄人口比例逐渐升高、少年儿童和老龄人口比例维持在较低水平。^③ 1871 年、1878 年、1896 年、1910 年进行的四次具有现代意义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非中国籍少年人口抚养比分别回落至 44.22%、40.76%、36.29% 和 40.90%,而同期中国籍少年人口抚养比则降至更低的水平,分别为 26.53%、34.18%、38.64%、25.51%。相对于非中国籍人口,华人的老年抚养比和少年抚养比在绝大多数年份明显偏低。特别是在 1871 年和 1910 年,华人的口抚养比甚至低于非中国籍人口 20% 以上。这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较高而被抚养人口比例较低的人口结构,导致此时澳门的劳动供给量相对丰富、国民储蓄率较高而社会保障压力较小,形成了一个世界城市发展史上较为

① [葡] 苏一扬 (Ivo Carneiro de Sousa):《前工业化澳门的居民及人口体系 (16—19 世纪)》,《澳门史新编》第 3 册,澳门:澳门基金会,2008 年,第 1021—1022 页。

② [葡] José de Aquio Guimaraes e Freitas, *Memoria sobre Macau*, Real Imprensa da Universidade, Coimbra, 1828, p. 14.

③ 按照国际上通行的人口年龄结构划分类型,当一个国家或城市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 10%,或 65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 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城市已步入老龄化社会。近代澳门四次人口统计调查采用的是通用标准,即 14 岁及以下和 65 岁及以上人口视为非劳动年龄人口,15—64 周岁人口视为劳动年龄人口。

罕见的“人口机会窗口期”。通过对比这几次普查数据可以发现，内地青壮年劳动人口的大量涌入应该视为19世纪中叶转型期人口结构变迁的主要特征，持续数十年的人口红利为澳门经济转型提供了巨大的机会窗口。

表1 近代澳门的人口抚养比、少年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

年 份		1871 年	1878 年	1896 年	1910 年
人口抚养比	非中国籍人口	49.73%	46.82%	38.33%	52.56%
	中国籍人口	29.63%	37.58%	41.58%	26.85%
少年抚养比	非中国籍人口	44.22%	40.76%	36.29%	40.90%
	中国籍人口	26.53%	34.18%	38.64%	25.51%
老年抚养比	非中国籍人口	5.51%	6.06%	2.04%	11.66%
	中国籍人口	3.10%	3.40%	2.94%	1.34%

数据源：作者根据澳门1871年、1878年、1896年和1910年四次人口普查数据进行计算。原始资料参见[葡]古万年、戴敏丽：《澳门及其人口演变500年（1500—2000）：人口、社会及经济探讨》，澳门：统计暨普查司，1998年，第22、23、55页。

（二）人口性别比

早期东来的葡萄牙殖民者普遍存在蓄奴传统，除了从印度和马六甲等地带来众多女仆之外，还从中国沿海、日本和菲律宾等地购买和掠夺女奴。^①至少在明代万历末年，澳门人口结构中“女众男寡”的格局已初步形成。1681年，一份关于澳门人口构成的荷兰报告显示，澳门有士兵150人，城市居民2000—3000人，但有妇女12000人，男女性别比在1：4左右；^②1730年，澳葡当局向中国官员呈报的外国人口男女

① [葡] Ana Maria Amaro, *Filhos da Terra*, p. 13. 转引自朱俊芳：《明清时期澳门人口女性居多现象原因初探》，《文化杂志》（澳门），2004年春季刊。

② [英] C. R. Boxer, *Fidalgos in the Far East 1550-1770*, p. 203. 转引自朱俊芳：《明清时期澳门人口女性居多现象原因初探》，《文化杂志》（澳门），2004年春季刊，第172—174页。

比例为1:2;^①1750年前后,据香山知县张甄陶记载,“今在澳之夷约六百多家,每家约三男五女”,“夷少男而多女”。^②1810—1834年较为详尽的男女性别比统计数据显示,澳门的基督徒人口中女性比例一直保持在61%—67%之间,至1839年才回落到53%;1810—1839年的奴隶数目也显示,澳门的女奴比例也一直远高于男奴比例。^③值得一提的是,明清时期澳门这种畸形的男女性别结构是与其养尊处优的殖民社会形态和单一的海上贸易模式相匹配的。早期葡人中绝大部分为殖民者、冒险家和商人,一旦海上贸易得手便蓄奴纳妾、大肆挥霍,而一旦海上贸易不景气或遭遇风险便血本无归、抛妻弃子,这种经济结构导致男性的死亡率和女性的被供养比例相对较高,^④而全社会的劳动参与率则较低。即便是葡人的蓄奴纳妾习惯遭到宗教界人士和中国官员的强烈抵制和抗议,但是澳门的女人仍然“多得像蜂房里的蜜蜂”。^⑤

随着19世纪中叶内地青壮年劳动年龄人口的大量涌入,澳门自明清以来“女众男寡”的性别结构也发生了根本变化。1871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包括华人人口和非中国籍人口在内的全澳门人口的男女性别比高达1.93:1。并且在15—64岁之间的劳动年龄人口中,男女性别比

① 该人口构成包括外国男子517名,男奴663名,妇女1397名,女仆990名。引自[清]暴煜主修:《香山县志》卷8“濠镜番”,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据清乾隆十五年刻本影印本,第948—949页。

② [清]张甄陶:《澳门图说》,《清经世文编》卷83,第59、60页;[清]田明耀主修、陈澧等纂:《香山县志》卷8“海防”,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据清光绪五年刊刻影印本,第531页。

③ 朱俊芳:《明清时期澳门人口女性居多现象原因初探》,《文化杂志》(澳门),2004年春季刊。

④ 相关研究可参见阿马罗:《澳门妇女:据16—19世纪旅行家的记载》,《文化杂志》(澳门),1993年第17期,第96页;朱俊芳:《明清时期澳门人口女性居多现象原因初探》,《文化杂志》(澳门),2004年春季刊,第175—176页。

⑤ [葡]莱萨:《澳门人口:一个混合社会的起源和发展》,《文化杂志》(澳门),1994年春季刊。